

《经济学家茶座》精品栏目系列

国是我见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陈 抗 黄有光 王松奇 梁小民 茅于軾
朱恒鹏 张晓晶 李海舰 党国英 韦 森
张 军 赵 泉 韩朝华 徐康宁 叶 航
王则柯 卢周来 赖德胜 荆林波 王玉霞
高新军 陈 宪 姚益龙 盛 洪 赵 晓
钟 伟 贺力平 胡海鸥 高明华 蒲勇健
曹利群 邱 斌 宋胜洲 韩德强 卢昌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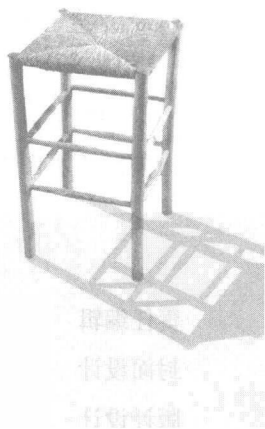
读《国是我见》，听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为国是建言献策。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家茶座》精品栏目系列

国是我见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读《国是我见》，
听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
为国是建言献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是我见/金明善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2
(《经济学家茶座》精品栏目系列)

ISBN 978-7-209-04671-8

I. 国… II. 金…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720 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刘冉冉

国是我见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8209802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72mm×232mm)

印 张 33.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671-8

定 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目 录

- 陈 抗 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001
- 黄有光 跳下地狱？走上天堂？ /005
- 王松奇 为什么说“大陆缺个李国鼎”？ /009
- 梁小民 为什么民营企业做不大 /013
- 韩朝华 保护私人产权是保护大款吗？ /020
- 张晓晶 次贷危机的警示：经济学还无法把握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023
- 胡海鸣 不见得比我们聪明的西方人为什么比我们成功？ /028
- 朱恒鹏 周扒皮为什么半夜学鸡叫？ /031
- 董国政 战争：国际资本的狂欢节？ /038
- 李海舰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三大法则 /042
- 党国英 家庭的产生与颠覆 /046
- 陈 抗 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
——兼谈“反公地悲剧” /053
- 董国政 从消费行为看战争 /058
- 乔 良 王湘德 算计成本和收益的战争 /062
- 赵 泉 人口：从真理到谎言？ /068
- 朱恒鹏 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072
- 朱恒鹏 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079
- 朱恒鹏 谁的新农村：土地何不归农民所有？ /087
- 富景筠 资源丰富是经济成功的条件吗？ /095
- 韦 森 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 /100
- 茅于軾 追踪钞票的周转 /106
- 俞宪忠 让中国农民富裕并不难 /108



- 韩朝华 官员行为的公益性和私益性 /111
- 胡海鸥 从明嘉靖的“改稻为桑”看政府干预的必要 /116
- 翟 华 老庄遇上基尼：幸福快乐不仅是一种感觉 /119
- 程亚文 中国还需过大关 /123
- 徐昌生 百姓的自主生育妨碍国家的强大吗？ /131
- 徐康宁 “软实力”的背后是什么？ /137
- 朱恒鹏 免费的午餐
——关于医疗改革的虚拟对话之一 /140
- 朱恒鹏 医保的困惑
——关于医疗改革的虚拟对话之二 /148
- 徐康宁 全球化的代价 /156
- 宋胜洲 负责任的政府 /161
- 徐昌生 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公立大学太多 /166
- 高明华 国有企业是做什么的 /171
- 韩朝华 改革反思应戒泛道德化清谈 /176
- 韩德强 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恶 /179
- 程亚文 人口再生产宜均衡适度 /185
- 朱恒鹏 疯狂的药价 /189
- 董新兴 孙德圣 关于制度与效率的通信 /199
- 王松奇 漫话世界一流强国的三维标准 /202
- 荆林波 政府管制倾向 /207
- 李海舰 解在哪里？——求解之道 /210
- 王松奇 我们手中的货币会不会变成贝壳？
——漫谈全球化中的国家战略和价值观 /216
- 李海舰 产品的革命：产品是什么？ /221



- 柯华庆 我们人民:科斯的国家主义视角 /224
- 王玉霞 效率与公平动态均衡 /229
- 黄有光 大城市是否应该限制外来移民?
——兼谈报酬递增与 E-F 冲突 /232
- 李海舰 企业的革命:企业是什么? /236
- 张晓晶 拉美国家的“海归”及其思考 /241
- 李海舰 十大关系新论
——基于企业经济的视角 /246
- 李海舰 企业文化十大转型 /252
- 赵红军 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 /255
- 朱富强 为什么那些民主国家往往显得更为好斗? /259
- 高新军 从我申请赴美签证看美国是怎么监督行政官员的 /264
- 王松奇 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 /267
- 宋胜洲 超越市场和政府的“上帝之手” /271
- 王永钦 制度密集型产业 /276
- 贺力平 亚当·斯密与和谐社会的法制建设 /280
- 封进 财富不平等为何是低估的 /284
- 叶航 合作效率的三个维度:自由、道德与正义 /287
- 陈抗 资本家为什么要破坏资本主义? /293
- 曹利群 报账制度背后的制度 /297
- 王则柯 交易创造财富 /301
- 聂辉华 范志勇 李金波 穷人和富人的竞争 /307
- 聂辉华 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 /312
- 唐志军 替代与忠诚 /317
- 曹利群 车辆限行与产权限行 /322



- 聂辉华 什么才是和谐社会? /326
- 黄范章 漫谈“纳税意识”与“民主意识” /330
- 曹利群 以优秀的制度塑造人 /335
- 蒲勇健 经济学透视下之官场现形记之一:官僚低薪 /339
- 朱恒鹏 为何把牛奶倒入大海 /344
- 董国政 因战争而受益的十类人 /353
- 陈 宪 高校扩招、人才结构与职业教育 /358
- 邱 斌 “高薪”还能养什么? /362
- 陈 宪 高速公路的路权能够被交易吗 /366
- 郭艳茹 香港的私家路:关于公共品供应与公共事业改革的思考 /369
- 曹利群 冰雪灾害中的政府和市场 /373
- 冯维江 利益集团转型:堕落还是升华 /378
- 陈 宪 市场发育了,社会怎么办 /384
- 孟 昌 如果房价计入了CPI /388
- 陈 宪 服务资源配置的时空难题 /391
- 王永钦 社会变革的三个层次 /395
- 曹利群 购买产品,还是购买制度? /397
- 韩德强 垄断型人际关系与竞争型人际关系 /401
- 朱恒鹏 折翼的天使——医生怎么了 /406
- 卢昌崇 目标的实现与激励的相容——来自军队的启示 /414
- 顾海兵 李宏梅 中国大学成本计算存在严重低估 /419
- 董志强 经济行为的公平原则 /424
- 陈 抗 三种忠诚——也谈退出机制 /428
- 吴要武 赵 泉 自然资源:神赐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 /432
- 赖德胜 科尔内的价值与智力外流 /438
- 卢周来 “无根”的社会代价 /441



- 杨在军** 家族企业:家族与企业的“天作之合” /445
- 蔡 昉** 劳动力市场上规则太多是好事吗? /450
- 谷 容** 中国军人的经济角色 /453
- 董国政** **费晓琳** 资源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 /457
- 钟 伟**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
——冷视反全球化运动 /462
- 李海舰** 跨国公司是全球“四个代表” /468
- 姚益龙** 从走军旗到走象棋
——WTO时代的政府职能转变漫谈 /474
- 蒲勇健** 在香港为什么少见乞丐
——关于生存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之猜想 /481
- 吴承明** 中国 GDP 的故事 /487
- 李海舰** 现代企业家:玩什么?怎么玩?
——企业十大最新玩法 /492
- 黄有光** 一元就是一元:为何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 /499
- 王跃生** 《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
——谈谈制度与国家 /502
- 杨瑞龙** 交道口的黄灯只是摆设吗
——兼谈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功能 /505
- 张 军** 关于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闲话 /509
- 李红刚** 洛杉矶判决与关于处罚的经济学 /512
- 李俊慧** 日元面额改小为何难?
——约束条件的重要性 /515
- 唐丰义** 市场经济与人本主义 /523
- 赵 晓**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吗
——从银行的差别化服务谈起 /527



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陈 抗*

每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存在部门利益(包括地方利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部门利益像我们中国这样和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联系得这么紧密、在体制中获得这么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部门利益个人化演变到今天,已经直接地危害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市场机制的建立,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近年来社会中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和危机事件,都与部门利益个人化有紧密联系。部门利益的喧嚣是和谐社会交响乐中最刺耳的噪音。整合部门利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部门利益个人化曾经 是一种“风险补贴”

部门利益个人化,实际上是改革初期为了激励政府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而提供的一种“风险补贴”。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对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结

论。能够从上到下推动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但成效甚微,而且容易重新陷入“放”与“收”、分权与集权的怪圈。要把握历史的机遇、形成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就必须推动自下而上的全方位改革。而民众当时对改革有巨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源泉。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体现了广大群众求变革、求发展的强烈欲望。只要不受压制,这股改革力量就能够猛烈地冲击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给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注入强有力的生命力。显然,自下而上的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广大群众挖计划经济墙脚的行为会不会容忍、敢不敢放任。

然而,地方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必须冒很大的风险。由于维护计划经济的法规仍然有效,而改革的试验往往要经历一段“不合法”的过程,支持或者默许改革就意味着要冒“违规犯法”的风险,很容易被抓住把柄而受到

*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



整肃。今天的改革急先锋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阶下囚。因此,即使那些思想解放、务实求新的地方干部也必须谨慎行事,避免“中箭落马”。所以,改革领导人一方面要不断呼吁干部们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另一方面,还要提供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官员支持改革,把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市场化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财政困难、政府官员收入低的条件下,允许政府部门创收以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便成为一种“情有可原”的权宜之计。创收政策与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隐性补偿机制。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得到认可。各级政府部门创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商店、企业等经济实体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创收结果的差异性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政府官员的奖金与福利出现很大的差别,进一步激励他们通过制度创新扩大创收、改善个人福利。

隐性的补偿机制有效地减少了官僚体制对市场化改革的阻挠和限制,使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得以大面积、大范围地推展。与此同时,一个自身利益与市场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利益集团逐渐在体制内形成,使改革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政府部门的创收活动逐渐演变成

制度化的集体腐败行为。当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之后,支持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继续允许政府部门创收相当于提供过时的“风险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特点和危害

部门利益个人化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三大鲜明的特点。一是部门利益个人化的合理性不受质疑。部门领导维护部门利益时理直气壮,俨然一脸为集体谋福利的大义凛然。上级领导对此行为也表示可以理解,因为自己也有过“屁股指挥脑袋”的经验。政府部门利用特权,通过违反国家法规的方式获得部门利益,最后集体分肥。而人们对这些集体腐败、公款行贿的现象也开始见怪不怪,有的甚至公开地总结和传授“创收”经验。

第二大特点是部门利益的合法性由于在界定部门权力时广泛使用“创造性模糊”而逐渐树立。随着改革的深入,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法规被淘汰,市场经济的法规也逐步建立起来。然而,由于立法过程不讲究利益回避,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一方面试图将本部门既定利益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想争取更多的利益。激烈的讨价还价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而最好解



决方法就是“创造性的模糊”。模棱两可的法规造成行政权力多头授予，赋予多个部门规章制定权，为部门竞相创租留口子。

第三大特点是“创造性模糊”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出现“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的现象(对于“反公地悲剧”的概念，本人在《经济学家茶座》第12辑《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一文中有详细介绍)。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争夺监督、检查、审批权。因为有了“合法管理权”就有“合法伤害权”，就能获得部门利益。多个政府部门在他们管辖的行政“公地”上竞相创租、抽租，毫不顾忌他们的攫取行为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带来的总体伤害。另一方面，从“合法伤害权”衍生出来的“合法扶助权”也可以为部门获得利益。帮助被抽租对象减少“伤害”往往需要阻挠别的政府部门行使权力。所以，一部门行使“合法扶助权”就会限制其他部门权力的行使。多个部门一起行使“合法扶助权”，互相牵制，使政府的执政能力成为一种“反公地”。实际上，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制约其他相关部门的管理，但是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权。那些由七八个政府主管部门共同下达的红头文件看似来势汹汹，实际上效果甚微。

显然，部门利益个人化危害极大。

首先，“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大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见利益就争，见服务就推，见责任就躲。只有等到问题累积成危机时才有人过问。

其次，创收游离于正常财政开支之外，其不透明性和任意性形成了腐败的温床。集体腐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难度。

再次，政府部门的创租活动鼓励垄断、限制竞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攫取行为给中小型企业 and 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设置进入壁垒，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经营环境。这对于市场的培育、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都十分不利。

另外，部门利益的影响使公平竞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无法建立。中央各部委的规章以及各级地方人大的法规不一致、不协调也影响法规的权威性。

最后，创收导致政府部门的不断膨胀。为了创收，需要扩大创收队伍。而创收队伍的扩大又制造了创造更多收入的需求。

整合部门利益势在必行

整合部门利益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切割。



首先要规范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转型过程中靠部门创收提供激励的方式必须停止。对公务员、政府官员的激励应该为级别晋升，相应的收入和待遇必须由国家统一规定、发放。

其次，要立法废除和禁止预算外、体制外收入。所有政府收入、开支都必须纳入政府预算内，受各级人大监督。中央、省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必须合理化和制度化，也必须立法杜绝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层层盘剥。

最后，要建立利益回避制度，通过立法解决多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的问题，清楚地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与权限。

以上三点改革必然会牵涉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受到多方阻挠。但也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1998年中央禁止军队经商、分离军队企业的变革就是一个先例。当时涉及的利益之多、人员之广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一旦中央下定决心，辅之予合理的利益补偿，变革的攻坚任务还是得到圆满完成。

整合部门利益与目前正在酝酿实施的“大部委制”有实质性的区别。诚

然，“大部委制”可以减少部委外的职能交叉。但是，如果不在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作切割，部委内实质性的整合将难以实现，各级政府之间利益格局没有改变，各种创租和抽租活动也不会减少。现在有一些地方实行了“阳光工资”制度，希望以此来废除创收和小金库，切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从实施的初步效果看，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对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管，在于是否真正废除部门创收。而这方面的立法、执法以及上下级财政关系的理顺，都必须在全国统筹解决，不是单一省、市力所能及的事。

其实，切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不但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于一些部门领导来说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没有了扭曲政绩观引导下攀比竞争的浮躁，换来的是量入为出的实在。告别了庞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告别了为把盘子做大而不惜冒险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提心吊胆，还告别了为遮挡伸到盘子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手而产生的各种烦恼。从乱到治，有失也有得。



跳下地狱？走上天堂？

——全球暖化、刺激大脑、基因工程及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启示

黄有光*

就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十字路口。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中，很可能曾经多次面临存亡的危险，却从来没有面临灭亡与极乐的十字路口。现在的危机，和以前的有两大不同。第一，以前的危机，应该是环境的自然改变或其他的物种的竞争所造成；现在的危机，是人类自掘坟墓。第二，如果人类能够避免自掘坟墓，因环境破坏而灭亡，则将能通过科技的进步，用电流刺激大脑“享乐中心”、基因工程等方法，使人们的快乐增加千万倍。得与失相差之大，莫此为甚，不可不重视与谨慎处理。

许多读者大概会认为笔者是在危言耸听，言过其实。非也！很多环境科学家认为人类只剩下一二十年的时间来避免人类因环境破坏而灭亡。笔者说一两代，并没有夸大。单单温室效应或全球暖化这一问题，若不能及时处理，就可能要人类的命。

人类自掘坟墓？

近两三个月来，不但英国皇家学会宣称，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全球暖化已经是和地心引力与进化论同样肯定的事实，连政界、商界名人也出来强调环保的重要。例如，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培训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帮助他在全世界宣传环保；英国亿万富翁R.Branson捐款20亿美元来防止全球暖化。近日，连右翼大众媒介巨子R.Murdoch也出来说，即使未能完全确定，也应该把存疑的利益，给予地球。

暖化使南北极的冰块消融，冰块面积减少使反射回太空的太阳光也减少，加速暖化。冰块消融使海平面上升，使低地变成海底，等等。近几十年来，暖化的速度大大超过环境科学家以前的估计。

*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访问教授、澳洲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本文是根据作者于2006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的复旦-汇丰讲座的演讲改写。关于刺激大脑的论述，部分取材自作者所著的《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附录A。



不过,许多人不重视甚至怀疑暖化。为什么?最近有人统计,从数以千计的关于暖化问题的学术论文中抽取百分之十的样本,发现肯定暖化的是百分之百。然而,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却是肯定与怀疑暖化的参半。这没有什么奇怪。2007年1月3日,媒体报道说,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透露,从1998到2005年,ExxonMobil公司给43个右翼团体1600万美元,进行误导公众的宣传,使人们怀疑全球暖化的科学基础。

那些到现在还不承认空气污染、全球暖化等环保问题的严重性的经济学者,不是被右翼宣传所骗,或是躲在象牙塔,就是被其极端右翼的,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意识形态所迷惑。(笔者说经济学者,因为在学者中,好像只有右翼经济学者不承认有环保问题。)

笔者也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承认市场调节的功能,也非常支持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但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是一种外部成本,污染者(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本人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不能由市场来处理,必须由政府甚至全球各国合作,对污染进行课税或限制。

刺激大脑“享乐中心”

早在50多年前,奥尔兹与米尔勒(J. Olds与P. Milner, 1954)试验显示,如果在某个地方对老鼠的一些大脑部位施加电流刺激之后,老鼠会自发地回到该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可分别产生快感(内侧前脑束、隔区、边缘区及下丘脑区)、痛感以及暧昧或混合感觉的大脑区域。用电流刺激人大脑中的某些“享乐中心”,可以缓解病痛和诱发极度的快感。电流刺激大脑带来的快感是如此巨大,使老鼠甘愿为之放弃进食和交配。刺激大脑还可以当做增进快感的“导火线”来使用。例如,黑斯(R.G. Heath, 1964, p.236)报告说,“(来自刺激的)强烈快感类似于性兴奋的感觉,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会自发地到达性高潮。……该名女患者已是第三次结婚,在接受脑刺激之前……从未有过性高潮的体验,但是自那以后她每次性交时都能达到高潮。”一旦适当的神经元被激活,它们对刺激就更为敏感,这是因为建立起了正确的神经通路。

和吸用毒品不一样,刺激大脑对健康没有不良影响。只要方法得当,每天持续接受刺激大脑一段时间并长期坚持(例如每天几小时,如此数年)没有任何不良反应(M.M. Patterson 与R.P. Kesner, 1981)。因此,如果说刺激大脑上瘾有什么危害的话,唯一的可能是它会使人荒废自己的责任,以至于影响他人(尤其是儿女)的福



祉。不过,尽管刺激大脑产生的快感非常强烈,我估计对它的心理依赖也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对刺激大脑上瘾的老鼠会不停地寻求这种刺激直到累垮为止,但是人“每天只需要半小时就足够了”。与其他的快乐和目标相比,刺激大脑提供的快感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相信神创论的话,也许上帝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是为了使我们不但能造福于自身,而且能造福其他动物。即使刺激大脑真的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依赖,我们也可以用法律或者技术上的手段来限制其滥用。

最妙的是,刺激大脑的快感没有边际效用递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等享受,是通过对感觉神经的刺激,再传到大脑。这种快感有很强的边际效用递减作用。肚子饿了,吃新鲜有营养的食物,会有很好吃的感觉;吃饱了,边际效用减少到零,甚至是负效用。这是造物主或进化的安排,使我们及时进食,而又不过度。但是,对大脑享乐中心的直接刺激,没有通过周围的感觉神经,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而且其快感跟新奇与否无关,因而能长期保持。此外,刺激大脑引起的快感的强度不随持续时间的延长而下降(不论是持续不断的刺激还是连续数年每天接受一次刺激)。因此,刺激大脑带来的巨大快乐会长期保持,并且能通过刺激技术的不断改进而得以提高。

也许有人担心刺激大脑会大大削弱人际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只需拨动按钮就能自得其乐,他就不会花心思去培养人际关系。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使刺激大脑可以带来很大的快感,也不会影响人类对友情的本能渴求。其次,刺激大脑带给人的满足感似乎不能与完美的性关系相比,因为后者能同时产生对大脑多个部位的刺激,并且有亲密的肉体接触;它似乎也不能与最高层次的精神满足相媲美。刺激大脑提供的快感能填补许多人这方面的不足,使人变得幸福而随和,这样也许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改善人际关系。最后,即使人际关系真的淡漠了,刺激大脑带来的益处还是很可能远远超过这一损失。

虽然刺激大脑能大量增加我们的快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除了一些零星的科研试验和有限的临床应用之外,刺激大脑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重视。我希望各国大力加强对刺激大脑的研究,使之最终能被广泛应用。

用基因工程打破“生理玄关”

每个人有一个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正常快乐水平,但这一水平受环境与该人的活动影响,会有高峰,也有低谷。了解影响快乐的因素,或有助于提高平均快乐水平,但受生理的局限,很难大量提高。刺激大脑,是打破必须通过周围的感觉神经,



且高度边际效用递减的享乐方式,而能直接获得高度快感的方法。然而,刺激大脑享乐中心所得到的快感的程度,还是受到生理的局限。能够打破这个局限的,是基因工程。

目前,基因工程主要应用在增加粮食产量,改进品种等。在小康水平之后,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因此,增加产量的基因工程,可能有助于减少饥荒,并不能大大增加小康线以上的人们的快乐。用在医药治疗方面,可能有不少重要贡献。然而,长期而言,基因工程的贡献,主要在于改造我们自己。

既然正常的快乐水平大致是由基因决定的,适当地改进基因,是打破生理局限,百千倍地提高我们的快乐的可行之道。开始时,主要的可能性大概只是选择乐观、外向性等基因。长期来说,不能排除直接提高我们各种快感的程度或水平。由于产生与增加快感有生理上的成本,我们的快感水平有一定的限度,增加消费并不能继续增加快感,反而会乐极生悲。当科技水平达到足够高的水准时,就有可能提高基因工程直接提供我们各种快感的程度,就能打破“生理玄关”,得到极乐。

改造基因,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危险性比对环保不负责的高速发展还小得多,而且可以谨慎进行,避免危险。

有人会说这些方法都是不自然的。然而,绝大多数文明产物、制度、医疗手段等等,都可以说是不自然的。如果你跟几百年前的人说,现在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是坐在沙发上看一个箱子上的影子,他们也会认为是很不自然的。

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并不能通过提高私人消费来增加快乐,但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促进科技的进步,却有可能使我们的快乐水平翻十番,或增加一千倍!

由于人类面对有可能千万倍地增加快乐的可能,我们就更应该确保,不要为了一些大商家的短期利润,或小布什的竞选基金,就拒签京都协议,自掘坟墓,因没有及时进行环保而灭亡,断送了我们或子孙达到极乐世界的可能性。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是要全力着重高速发展,或是要兼顾平等、环保、科技等更能增加快乐的方面,值得我们深思。近来提出的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或是一个正确方向的开始。另外,中国也能够在刺激大脑与基因工程上,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为什么说“大陆缺个李国鼎”？

王松奇*

2005年年初,摩根斯坦利公司做出一份有关中国和印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结果的报告,据报告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印度13年,而13年之后,当印度的人均GDP达到中国目前的人均水准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可相当于届时印度经济总量的4倍。该报告还说,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所有方面都领先于印度——除了金融业。只有在金融领域印度明显领先于中国,并主要表现在机构资本金、风险评估机制和不良资产比率方面。

看到这个结论后,我本人生出不少问题和感想,主要有三点:一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报告的结论推算出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于总体改革的时间——大约为15年;二是为什么金融改革会如此步履蹒跚;三是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可能始终存在一个路径选择的认识问题,即我们至今还未找出一条最便捷的金融发展之路。我曾把这些零星感想写成一篇短文当做了《银行家》2005年第1期的刊首语,并在短文中胡诌了一首打油诗,诗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经济金融要调整,大陆缺个李国鼎。”前两句是借用古人的,由于毛泽东当年引用过,因此出处用意人人尽知。后两句说“经济金融要调整,大陆缺个李国鼎”,很多人包括一些已拿了博士学位的人,看了以后也浑如丈二和尚,纷纷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用白居易的诗歌分类方法衡量,我凑的那首打油诗不属闲适类而属讽喻类,而讽喻诗自古而今都是作者曲折表达兼济之志的一种文学手法。在许多环境下,直说有诸多不便,就只好借助于“讽喻”了。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可以说是找准了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弊端,但要把科学发展观衍化为切实有效的经济金融政策却殊非易事。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缺少的已不是理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推手。

以银行改革为例。小平同志早在20年前就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但从现状看,我们的国有银行距离小平同志所说的“真正的银行”即效率较高的商业银行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再以创业投资为例。早在1985年,“创业投资”概念就被写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创业投资依然是发育尚不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